

DOI: 10.13317/j.cnki.jdskxb.2021.011

“大历史观”下 中国道路自信逻辑的三重认知维度

杨增崇

摘要:习近平多次提及“大历史”“大历史观”问题,这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视角,特别是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优势及坚定道路自信提供了重要的致思逻辑。以大历史观来看,当代中国道路自信逻辑至少存在三重认知维度:一是从“长线段位”角度看的中西文明和文化发展比较的维度;二是从“中线段位”角度看的中国和西方主要大国现代化之路比较的维度;三是从“近线段位”角度看的两个“未有之大变局”之百余年时空转化的维度。以大历史观之,我国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拓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足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体系有着巨大优势。

关键词:大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自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18VXK001);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LLKDA004);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项目

作者简介:杨增崇,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21)02-0001-12

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论及“大历史”“大历史观”问题。例如,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深刻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②。习近平强调:“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N]. 人民日报,2019-04-21(1).

^②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0.

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①“用这样一种大历史观来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也是他治国理政的重要特点。”^②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思维和历史智慧,所谓大历史、大历史观正是这种思维和智慧的一种重要体现。把现在的事同历史的逻辑发展联系起来,把历史现象或碎片化的历史情境同整个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和趋势联系起来,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合理的预测,对现在的事进行科学合理客观的定性,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和过程的研究和观点,我们称之为大历史观。大历史观侧重于历史的动态观察和纵向研究,强调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把历史置于总体坐标中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只不过,这种长时段是从相对意义上讲的。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意义与内在逻辑,运用这种大历史观将更有助于在比较的视野中坚定道路自信。本文紧扣习近平的相关重要论述,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提出认识和理解中国道路的内在必然性进而坚定道路自信的三个逻辑维度^③。

一、在中西两种文明与文化的比照中认知和坚定道路自信

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对其文明和文化的发展走势具有决定性意义。反过来,透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状况,大体也能反映和判断出其所走道路的状况。这里所说的道路,是涵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的发展道路,需要通过系统建构起来的社会制度来保障。

(一) 中西方文明源始有别但文明是平等的,在交流互鉴中融合发展始终是历史常态

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各自的社会基础和地缘优势,同样的源远流长、影响至深。距今约一万年前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和北方草原文化区都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华夏族率先成为核心区域并向四周辐射,推动着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西方文明一般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被认为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集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深厚智慧,糅合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传统,包含着民主自由的因子,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建立在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及其相互融合的基础上的。习近平在访问希腊时所发表的文章以苏格拉底和孔子为喻,认为两者虽然各具东西方不同的“面具”,但是“理性”却是两者共同拥有的,如古希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 人民日报,2014-10-14(1).

^② 李君如.“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大历史观[N]. 北京日报,2017-04-24(13).

^③ 以大历史观理解中国道路自信的内在逻辑有多个维度,在本文里着重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为依据,在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主要聚焦于这三个维度,侧重“长线”“中线”和“近线”三个段位。

腊“智者学派”同中国儒家倡导和坚持的人本主义与“以民为本”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欧根尼恬静淡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就近似于中国的庄子^①。这段话不仅表达出古希腊与古中国的文化中的某些相似内容,更加印证了不论是何种文明,不论这种文明发祥于何时何地,都是同其他社会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命题,这个时代虽然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是它仍然是我们今天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它的吸引力在于它“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②，“正是因为那个时代所形成的‘突破’”具有了非凡的吸引力^③。可以肯定的是,雅斯贝斯正是站在世界历史整体性视野下来审视人类文明多样发展、共生共存的本质性特征的。

以大历史观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而且对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世界上的诸种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曾绽放过各自的光彩,都对人类社会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一认识在后来发生了明显变化,最有影响的是与雅斯贝斯不同的近半个世纪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这一论断指出文化将超越意识形态与经济成为未来国际社会产生冲突的主要根源。在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文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相似的文化将不同国家与地区凝聚在一起,并有利于促进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不同的文明以及这些文明所代表的国家之间通常表现出竞争性冷战或冷和平。这些论断过度放大了文明差异或者说是文化差异性在促进国际交流的阻碍作用,忽略了不同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一主要方面,其真正的目的是为美国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为霸权主义和强权利益做出“名正言顺”的掩护。然而,世界文明的差异本就不是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文明冲突论”错误地固守了“要对抗不要合作”的思维模式,掩饰了西方主要大国维护强权利益的真实意图。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不少与会人士对“文明冲突论”予以了强烈批评,指出其所谓“冲突”来源于思想深处的“文明优劣论”在作祟。事实上,所谓“文明冲突论”即便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也早已成为众矢之的^④。

从文明交流的历史常态来看,文明在交流互鉴并在融合中发展出多样性始终是一个客观现象。习近平指出,文明之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人可以通过肤色语言进行区别,但是文明无法决出优劣,更遑论武断地“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企图取代其他文明”^⑤。任何企图将文明当成一个

① 习近平. 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N]. 人民日报, 2019-11-11(1).

② 卡尔·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魏楚原, 俞新天,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9.

③ 罗容海. “轴心时代”的意义在于反本开新[N]. 光明日报, 2015-11-02(2).

④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外交部: 所谓“文明冲突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早就为世人所摒弃[EB/OL]. (2019-05-16)[2020-01-02]. <http://news.cri.cn/20190516/5d0c7ba5-c125-2bb5-da73-a01e7cc52f8c.html>.

⑤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6.

色调、一个模式的幻想,都是愚蠢而且灾难性的。不同文明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取代其他文明或居高临下于其他文明。“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①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明此消彼长现象的背后正是不同文明在交流交锋中取长补短、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今天人类文明的现实荣光与光明前景无不是建立在不同文明长期交流互鉴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性、独立性和多样性。

(二) 近代中国文化影响的式微并不完全是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纯粹证明,只是封建专制思想整体上落后于资本主义思想的证明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巨大打击,中华文明可谓伤痕累累。连同中华文明近代周遭的退败,中华文化影响也逐渐式微,但这并非绝对地意味着中国文化满盘不如西方文化。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从这点上讲,文化比较本是极为复杂之事。但当狭义地把文化理解为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现象,那么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价值观,文化的差异实际是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文化影响力的大小也是价值观影响力的大小。封建社会为维系专制统治而建构起来的价值观同西方资产阶级所创生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相比是落后的,现实中遭遇挑战也是必然的。西方启蒙思想对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的批判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其思想所具有的进步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要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落后于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文化是客观事实,只不过不能据此就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某种文化是否存在其合理性,绝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不能简单地认为一种文化的衰落就一定能衬托出另一种文化的优越,也不能认为一种文化的兴盛就可以忽视甚至取代其他文化的存在。通过对立思维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与中华文化的衰落,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罗素曾把中国文明同欧洲文明进行过比较,认为中国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众,都缺乏宗教观念,只是有一套较为成熟和完整的伦理制度,“直到晚近受欧洲影响,中国才有了科学,有了工业主义”^②。而这个古老的文明一旦同西方文明相接触,就很迫切地学习西方的学问,在罗素看来不仅学习西方可以有效挽救危亡局面并抵御外来侵略,更在于学问本身就是中国人追求的“好东西”,“中国人向来重视学问,只是以前所研究的学问都是古典文献。现在,他们普遍意识到西方的知识的有用”^③。近代以来,面对国家和民族的衰落,中国人开始注重“西学”,这是中

① 习近平.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N]. 人民日报, 2021-01-26(2)

② 罗素. 中国问题: 哲学家对 80 年前的中国印象[M]. 秦悦, 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151.

③ 同②.

华民族自觉与自立意识觉醒的过程。西方列强的侵略打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更摧毁了中国人赖以自豪的意义价值系统,使中国开始不由自主地以西方的意义价值系统审视和评判自身文化,中国人承受着由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转变的巨大心理势差。胡适等人之所以认为“诸事不如人”^①,所谓全盘西化论,无非是知识分子面对此时一蹶不振之中国而无奈之下的感叹,不应该将其作为中华文化整体上^②不如西方文化的逻辑证明。“从总体上看,‘亚洲—中国’文化和‘西方—欧洲’文化就像两辆在十字路口相遇的车。谁都不想与对方交锋,却都对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法律和思想坚信不疑。21世纪将因此迎来一个真正的挑战:相互对立——像过去一样——或是审视对方,相互交流。”^③

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独特价值,文明不存在固定的“中心”,中国文化的衰落不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证明。“文化冲突论”“文明优劣论”“普世价值论”等观点错误地解读了历史,我们应该找寻共同价值观摒弃西方的“普世价值”,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和文化观,从而走出文明与文化的冲突。西方国家的崛起不过近三四百年的时间,纵使西方文明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对其他文明的确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无法就此将西方现代文明当作整个世界近现代文明的普遍范式。习近平强调:“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④。文明交流互鉴不仅会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道路的开辟使得中华文明与文化能够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逐步走向复兴

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从“被动抵触”到“自觉学鉴”再到今天“平等视之”的嬗变,在短短几十年光景的变奏之中,足以说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待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效的。近代以来,中华文化渐呈式微之势,面对“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性境遇,中国人民正是找到并依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所推动创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才逐步扭转了这一现实。

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复兴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中得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文明之源。深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中国道路的宝贵资源,为中国道路的行稳致远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道路是一条始终贯穿着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文化自信”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之于“四个自信”的

① 胡适. 胡适论读书[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12.

② 这里所用“整体上”一词,意在区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与糟粕,近代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缺陷就是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未能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所在。

③ 皮埃尔·皮卡尔. 20年后,中国和世界[M]. 陈浩源,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96.

④ 习近平.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J]. 求是,2019(9):4-10.

基础性地位。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 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以大历史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内在衔接、相互贯通、有机结合、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华文明里面走出来的,没有中华文明也不会有中国道路。”^①

二、在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对比中认知和坚定道路自信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现代化是世界各个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纵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的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和转变过程,即为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广义的现代化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还涉及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这里的两种“现代化道路”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思维定势,在丰富了现代化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为其他后进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一)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之路及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带来了近四百年西方的繁荣与兴盛,也铸就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盲信

从现阶段来看,工业化仍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西欧各国因为率先进行工业革命,而引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把工业革命描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分水岭的说法并不夸张,因为它几乎决定了近代世界历史的走向。工业革命在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生产力飞跃式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由此拉开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令后进国家望尘莫及。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现代化之路的实质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化之路,最早出现的现代化模板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在美国学者福山看来,“通过研究英美等最先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国家,人们就能揭示一种所有国家都会遵循的普遍模式”,“尽管现代化理论家对于线性的历史演进会如何展开,是否存在取代现代性的道路存在分歧,但是,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的,而在历史的尽头矗立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③。美国学者罗兹·墨菲认为:“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起,西方在许多方面的效率达到了一种上升状态,这个时间很可能与亚洲大部分传统秩序的效率出现下降状态的时间吻合。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绝对的,它们在时间上的重叠构成了对立模式。”^④他所画的西方上升

① 郭建宁. 文化自信是中国道路的根基[EB/OL]. (2017-11-10)[2020-01-02].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qsft/2017-11/10/c_1121936612.htm.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③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陈高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9.

④ MURPHEY R.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5.

的曲线和亚洲下降的曲线相交的时间节点正好是 1815 年。这时的中国正逐步走向转折。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曾针对中国的状况描述到:中国被英国的大炮强行输入了鸦片这种麻醉剂,满洲贵族的声威、万世长存的朝贡迷信被英国的枪炮一扫而光,“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①。马克思曾分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乃至欧洲的影响,用“木乃伊”来比喻当时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那就是需要与外界完全隔绝才能自保,所以当英国打破了这种隔绝而使得“木乃伊”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中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②。但马克思同样认为中国必将在不断觉醒中实现变革,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垂死挣扎,届时西方人将“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③。

与西方先发内生性现代化不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性的。随着资本的扩张带来的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浪潮在逐步向纵深推进,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被压迫民族的意识觉醒开始交锋对决,一些国家或主动或被迫开始走上探索现代化之路。就近代中国而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激发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努力尝试革故鼎新,在器物、制度和思想三个层面学习西方自强以抵御外侵,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条路根本行不通。但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上尚未出现另一种能够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相竞争的现代化发展方案,所以西方现代化道路对许多谋求自身发展的落后国家而言成了不可替代的选择。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许多国家奉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为圭臬,芝加哥经济学派将其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传播至世界各地,虽然这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经济上的进步,然而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学习这种现代化道路而破解本国发展难题,反而出现了社会经济不稳定、独立性和主动性难以保障等问题。东亚的“雁行增长模式”在引发全球关注后仅三年时间,金融危机就让其掉入西方现代化的陷阱。从全球来看,并非所有照搬和依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之路的国家都真正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普遍的繁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对西方现代化成功之路的绝对性的迷信,造成了人们对现代性及现代化道路理解的“西方中心主义”,很大程度上将现代化理解为就是西方化。西方发达国家因其早先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因而不必“苦口婆心”也能让这种“影响力”转化为民众对资本主义内在价值的认知的优先性。一定意义上,“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出场”与近代以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可谓源出一辙。

(二) 中国道路在短时间里取得成功并带来了不同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之路,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并非是唯一、普遍和永恒的模式

就在全球经济呈现疲软态势之时,中国经济却“这边风景独好”。新中国成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7—608.

② 同①:608.

③ 同①:628.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多方面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自身无法规避的缺陷。实际上应该看到,西方国家仅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并不是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借鉴的现代化范本。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开始了人类某种意义上的自戕,引发社会领域里的不同冲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框架下的现代化无法摆脱剩余价值的驱使,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虽然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仅代表经济的增长。“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因为地球没有足够资源支撑,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对人类有所贡献。”^②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失调等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了一条自然、社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之路,一条互利互惠平等共赢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谋求资源的合理利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突出贡献。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现代化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融入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始终写在自己旗帜上,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所潜隐的工具理性、资本逻辑、个人至上是截然不同的。

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崛起是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当前的全球化国际形势下,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世人的期盼,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必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中国用自身生动的实践证明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国家发展不一定要走殖民扩张的道路。而且将来的中国也不会重蹈“修昔底德陷阱”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合作中来,携手实现和平、发展、合作的愿景”^③。我国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还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第一项是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最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8.5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国外有研究者通过研究后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60.

② 习近平武汉考察: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EB/OL]. (2013-07-23)[2020-01-02].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23/c364101-22290982.html>.

③ 习近平. 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重要演讲[N]. 人民日报,2015-11-08(1).

纪前 10 年,国际不平等的降低主要来源于人口众多的中国的人均 GDP 的快速增长,而在此期间,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是日益扩大的国际不平等”^①。中国因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扶贫,为减轻全球贫困做出了超过 70% 的贡献,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壮丽篇章。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举行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积极与世界分享减贫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世界经济低迷之际,中国勇于肩负引领全球化进程的责任与担当,为应对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为构建全球治理范式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可使 3 200 万人摆脱日均生活费低于 3.2 美元的中度贫困状态,使全球贸易增加 6.2%,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加 9.7%,全球收入增加 2.9%。”^②同时,中国经验也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对象,比如,近十年来越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注重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结合越南实际加以灵活运用。每当中国的党代会召开,重大经济政策发布和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立即被越南翻译成越文并加以深入研究”^③。此外,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让西班牙人羡慕,于是人民党仿效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措施和机制,设立了一套地道的西班牙版‘纪检委’制度^④。可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西方的现代化话语霸权,构建了一套中国享有独家解释权的现代化话语范式。“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⑤

三、从两个“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换中体认和坚定道路自信

立足对当今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⑥。这一“大变局”尽管主要是对当今世界之格局和形势的总体判断,但实际上也是反观今日中国时局的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和三个“意味着”的重要阐释,也是对时代发展总体格局的一种揭示。在这一点,“大变局”同新时代,同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间节点同步,都是共时态的表达。

(一) 第一个“大变局”体现的由盛及衰的苦难伊始及其后的根本扭转,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

近 150 年前,李鸿章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局势描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① 孔诤烽. 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M]. 沈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7.

② 高攀,邓仙来. 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发展中国家减贫[N]. 人民日报,2019-06-20(3).

③ 朱振明. 向中国取经,让越南少走了弯路[N]. 环球时报,2019-07-16(15).

④ 冯俊伟. 西班牙执政党也要设“纪委”[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2-16(2).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60.

⑥ 习近平接见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N]. 光明日报,2017-12-29(1).

局”,包括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常识》中论及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时也援引了李鸿章“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说。在“数千年”到“百年”之两个“未有之大变局”的指称的前后交替中,实际深含和呈现着近代历史以来中华民族不断追寻救亡图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画卷。只不过,李鸿章当年所叹同习近平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谓天壤之别。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发达的国家。“在过去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①,在秦汉两朝已经成为与罗马帝国并存的超级王国,在唐代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据英国经济计量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公元1000年中国GDP约占世界的22.7%,随后就一直保持在20%以上,到1820年达32.9%”^②。“中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其经济总量曾达到整个世界的50%。”^③可以说,中国在历史上长期都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如若不是,恐怕今天我们谈“民族复兴”,这一“复”字也就多少失去了实际意蕴。然而,应该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不断割地赔款,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当时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使社会经济发展遭遇严重破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危机。当时主要的几个国家正向近代化发展迈进。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生产力极大发展;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内战,之后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同年俄国实行农奴制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西方主要国家的快速发展与清王朝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中西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自此,救亡图强成为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尔后,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走上艰辛探索和抗争奋起之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纷纷登场,在未根本触动封建根基的情况下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革,但终以失败告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新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来,反而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内乱。各方军阀粉墨登场,都想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拔得头筹,但军阀的统治仍旧无法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

俄国的“十月革命”让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力量,历经多次挫折的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新的曙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

① 康拉德·赛茨. 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M]. 许文敏,李卡宁,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9.

②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 我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J]. 求是,2013(21):25-27.

③ 任泽平,罗志恒. 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24.

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经过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启蒙之后,终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相结合,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可以说,正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创生的中国共产党依据不断变化着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联系实际,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才有了光明前景,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 5 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所形成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经确立,即使得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衰颓得以根本扭转。

(二) 第二个“大变局”彰显的短短数十年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稳步迈向复兴,正是归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以更长的时间轴,才能更好地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如果说李鸿章惊呼清王朝“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印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历史,那么,新时代的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这一大变局不再是由盛及衰和积贫积弱,而是由衰向盛和更为自信自立,不是封闭被动而是开放主动。短短数十年我国飞速发展的的事实充分证明,只有中国道路才能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和强大中国。归根到底是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尔后,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进行改革开放,并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7.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

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①今天的中国已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引领了时代。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是对中国和世界的总体格局的客观判断,体现了对时代变迁及其特征的深刻而精准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也直接阐明了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蕴含着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内在逻辑。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复杂多变的新情况。“西方国家之间零和博弈所造成的地区冲突、环境问题、国际难民等,进一步加重了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的难度。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缺少价值共识及基本遵循,同时也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存在严重的伦理悖论。”^②面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世界需要新的选择和智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成了热词,我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作用更为突显。

在世界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以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恢宏视野、战略思维,为破解当今世界的发展之“困”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能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千年”到“百年”的“两个大变局”之时空转变,深刻彰显着社会主义道路的无穷魅力,内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彻底扭转时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拓展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和创生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无不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宣告了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

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③以大历史观认知和理解中国道路,我们必定会更加坚定自信。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紧跟时代步伐,锐意改革创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

(责任编辑 张向凤)

(下转第 41 页)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② 耿步建,沈丹丹. 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价值基础[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18.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21.

From Capital Logic to Human Logic: The Change of the Principle of Green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etter Life

Du Shiju, Cheng Mingyue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Green consumption aims to guide people to form a desire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society and nature, and is the corr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onsumption alienation, and accords with human logic instead of capital logic in practice, ethnics and spirit. From 2021 to 2049, we should strive to meet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offer a strong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prop for such a life by promoting the green upgrade of enterprises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green consumption products, improving systemic green reconstruction, building a legal environment for green consumption, promoting cultural green and cultivating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green consumption.

Key words: consumption alienation; green consumption; capital logic; human logic; better Life

(上接第 12 页)

The Triple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the Logic of China's Path Confidence from the Angle of Macro-history

Yang Zengdo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alked about the Macro-history time and again, enriching our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issues, and disclosing the logic behind China's choice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th confidence in particul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history, the logic behind contemporary China's path confidence can be approached at least from three aspect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in the long run,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outes to modernization taken by China and Western powers in the middle run,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wo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short run. In just dozens of years, China was able to rise from a poor country to a rich one, move from the edge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expand the route of moderniz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ntribute China's wisdom and China solution for human issues—this is enough to demonstrate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f China's system.

Key words: macro-history;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th confidence